

【专题论文】

日新学校董事会的国民党背景及选举纠纷

The Kuomintang Background of Jit Sin School Board Committee and Election Disputes

黄欣怡* (玛拉工艺大学)

Ooi Sing Ee

Universiti Teknologi MARA Cawangan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

E-mail: ooisingee@uitm.edu.my

Published online: 30 June 2021

To cite this article (APA): Sing Ee, O. (2021). 日新学校董事会的国民党背景及选举纠纷. *ERUDIT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Education*, 2(1), 150-169.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2.1.8.2021>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2.1.8.2021>

摘要

槟榔屿过港公立日新学校于民国七年（1918）由大山脚中华阅书报社联合当地福德正神会创办。该埠闻商兼同盟会盟主朱步云为日新学校正总理，同是书报社成员的何翼仁为副总理，书报社成员及福德正神会理事代表为校董。校董组织聚合了商业、庙宇、政治和教育交织的网络，相互在埠上立足。由书报社成员领导的董事会，自成立以来国民党背景鲜明。1925年书报社及国民党等机构相继解散后，日新学校跻身为该埠具改革意义的重要组织，董事会则成了各团体竞逐争权的场域，可从校董两次选举纠纷来说明。第一次选举纠纷发生在1938年，福德正神会因负责日新校舍经费，提出是否应增加其校董席位的问题，引发争议。黄坚固总理为确保旧董事在新届董事会选举蝉联，专请外埠人前来投票，遭同是国民党党员的朱步云严正斥责。第二次选举纠纷发生在1947年，黄坚固再次包办选举，引发左派校董抗议。

南洋华侨校董职权纠纷问题时有所闻，在歌颂建校发展及为贤者讳的前提下，向来不为学者正视与探讨。本文冀在日新建校百周年纪念，回头审视董事会领导人的职

*森美兰玛拉工艺大学讲师、苏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学中文学程博士生。

权纷争。由此下文将从书报社掌权学校董事会跻身社区领导阶层谈起，细梳1938年及1947年两次董事会派系争权及选举操纵的事件原委，以发挥校庆的意义。

关键词：日新学校、董事会、国民党、大山脚中华阅书报设、福德正神会

Abstract

Jit Sin Public School was founded in 1918 by the Philomatic Union and Hock Teik Cheng Sim Temple of Bukit Mertajam. Both of the organisations became the school board committee which gathered an intertwined network of commerce, temples, politics, and education to gain a foothold in the port. After the dissolution of the Philomatic Union and Kuomintang in 1925, Jit Sin Public School became an important reform organization in the city, and the school board committee became an area where various groups competed for power, as illustrated by two disputes over the election of a school board committee. The first election dispute occurred in 1938 when the Hock Teik Cheng Sim Temple was responsible for fun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Jit Sin Public School, leading to a controversy over whether the Hock Teik Cheng Sim Temple should increase its number of seats on the school board committee. The second election dispute occurred in 1947, when Huang again manipulated the election, prompting protests from leftist school board members.

The issue of disputes over the powers of the Nanyang Overseas Chinese School Board Committee has been heard from time to time, however far too little discuss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topic. This paper will examin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eadership of the school board committee and the disputes over the powers of the school board committee which were occurred in 1938 and 1947.

Keywords: Jit Sin School, School board committee, Kuomintang, The Philomatic Union of Bukit Mertajam, Hock Teik Cheng Sim Temple

前言

二十世纪初在南洋教育的改革呼声下，位于槟榔屿过港大山脚偏僻之埠亦能紧追其上。民国七年（1918），大山脚侨众代表在一片协商中创办公立日新学校。与槟城阅书报社成员独立创立钟灵学校有别的是，¹大山脚中华阅书报社在面临解散、无力办学时，结合已在当地扎根三十余年、获居民拥护的福德正神会，将该会原有义学堂改制成新学。²大山脚同盟会盟主及书报社创办人朱步云（1863-1947，又名沼初，字崇阶）为学校正总理，同是书报社成员的何翼仁为副总理，福德正神会理事与中华阅书报社成员代表为董事。众人在大山脚置有树胶、椰子、槟榔、豆蔻、胡椒园等产业，由此校董组织聚合了商业、庙宇、政治和学校交织的网络，相互在埠上立足。

从董事会正副总理的推选与部署，显然可见象征时代改革意义的中华阅书报社，较传统寺庙具有优势的社会政治地位与话语权。新式学校建立后成了演说共和真义和发挥三民主义的场域，³国民党色彩鲜明，甚而在书报社于1925年遭致英殖民政府下令解散后，承接起该团体的社会角色。校董将学校作开办文明结婚、庆祝孙中山选举大总统及联合工商团体举办双十节国庆日等活动的会场，学校在国民党、书报社及中华革命党解散后，跻身为大山脚具时代改革意义的组织。1930年代，为进一步推进华侨教育，沉寂一时的大山脚福德正神会提议倡办女学及夜学，却与日新学校董事会发生争办夜学事，又因资助该校建筑校舍经费，延伸出“福德正神会负责校舍经费，学校董事是否应增加其席位问题”的争议。日新学校时任正总理为黄坚固（1887-1957），为让旧董事会于新届选举蝉联，专请外埠人士前来投票，遭老同盟会党员朱步云斥责。黄坚固和福德正神会主席陈文泰都是国民党党员，此次纠纷像是国民党内部派系相互竞逐场域的延伸。⁴1947年，身兼国民党常委与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的黄坚固董事长再次包办选举，辞退左翼教员，引发左派校董抗议。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权，黄坚固董事长与同是国民党背景的新友及中正学校董事会决议将三校合并，并在10月10日举行合并仪式，此后改定是日为校庆日。此举无疑是在国共大分裂时代，向外展示校董鲜明的政治立场。

以劳动资本当家的校董，给予人的印象往往是勤勉刻苦，生活上节俭却对教育慷慨输捐，踊跃兴学。传记不乏各种美誉，⁵学术专题亦以毁家兴学为书写美事，甚少细

¹槟城阅书报社领袖陈新政、许生理等人将劄牛18号阅书报社前后两楼作钟灵学校校舍，办学经费亦由阅书报社成员共同承担。详见起予，〈钟灵学校之史略〉，《槟城阅书报社廿四周年纪念特刊》（槟城：槟城阅书报社，1931？年），页158、164。

²拥有了此次办学经验，大山脚中华阅书报社成员如卢乙良和卢柳堂等人于各自开垦及经商的地区，结合华商的财力，共同推动新学开创。1918年至1923年间，大山脚临近边区的居林觉民学校、三巴央新民公立学校及打锡肚启新学校相继开办。

³《新国民日报》，1921年5月23日，页9。

⁴大山脚国民党党员争夺日新学校董事会席位的纠纷，可引用伯恩斯坦教学机制理论来说明：“教学机制在实现时会制造一个各竞逐团体争夺的斗争场域，因为掌握教学机制者就有权利管制意识，夺取机制者就可以掌控符号控制的重要场域。”转引自黄庭康著，李宗义译，《比较霸权：战后新加坡及香港的华文学校政治》（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12月），页39。

⁵详见《南洋名人集传》、《远东人物志》、《马来西亚福建人兴学办教史料集》等著述。

梳董事会的政党背景及其绅商网络，更在为贤者讳的前提下，避而不谈严重的派系纠纷，是地方史与校史一大事记。下文将以当地报章《槟城新报》、《光华日报》⁶以及左倾的《现代日报》接续的新闻记述为依据，从书报社掌权学校董事会建立领导层谈起，梳理董事会1938年与1947年派系争权及选举操纵的事件原委。南洋华侨校董职权纠纷问题严重，时有所闻，⁷却未曾获得学者的正视与探讨。本文以大山脚日新学校二战前后颇为轰动的董事会选举纠纷为例，冀在建校百周年纪念的盛会，回头审视董事会领导人的权位纷争，发挥校庆的意义。⁸

一、书报社掌权学校董事会

十九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初年，南洋华侨绅商交织在经济、宗教、教育与政治的网络。据光绪廿一年（1895）立于大山脚福德正神会的〈大山脚义学堂碑〉记事：“溯我大山脚大伯公尝置园埔，为我华人贸易市货之所，设秤以收其税，邇年约金数佰，以充尝务，迄今三十余载。”约于1865年，大山脚福德正神会首先以“大伯公尝”的形式于市中心建立市集，十余年来逐步扩充，“始筑宫后之店，继营菜市之亭，今添建书房。数年之间，今昔迥异。昔之蔓草青青，今为屋宇叠叠矣；昔之秤税数百，今增店租盈千矣。设义学以育英才，蛮夷之俗，竟成礼义之邦矣。”碑文末端罗列了“各款使费开列规条”，包括该庙元天上帝、谭公爷、大伯公三位神诞演戏庆祝戏金、义学递年延教读先生两位束修，及“遇贫困在大伯公园身故，若无亲邻收敛者，向董事领给棺材壹副，免其尸骸暴露。”该会将华侨民间信仰、教育与社区福利集为一体来掌管，民众一切生活福利都由庙宇来安排。开办义学是进一步通过对读书人的敬重与中国文化传承的重担，来巩固该庙在社区的影响力。义学堂开办后，大山脚福德正神会董事黄陈庆等人，同时也是义学堂董事，凭借“神权”来建立“绅权”，⁹跻身为大山脚华侨社会领导人阶层。直至二十世纪初年，同盟会、书报社及中华革命党分部相继设立，改变了大山脚华侨社会的领导阶层。

大山脚华侨革命活动的行迹，可见于《南洋名人集传·卢炳勋》：

⁶本文所引《光华日报》及《现代日报》剪报为新加坡文史工作者洪毅翰提供，于此言谢。

⁷日新学校董事会的权位纠纷在华校发展史上并非单独事件，南洋董事会严重的职权问题早在刘士木等所编《南洋华侨教育论文集》提及。举例而言，李守善在〈南洋华侨教育效率低微的原因〉里说道：“虽然急公好义，捐资离篋，即视公有而绝不过问的侨胞不少，但是沽名钓誉，兴教育以为点缀，而顽固把持操纵者亦不乏其人。总之南洋华侨教育，在在受校董底牵制，于进展方面实在不幸。”详见刘士木等编，《南洋华侨教育论文集》（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1929），页141。

⁸董事部职权问题似老树盘根，在前人种树的伦理底下，乘凉的后人不应也不准提出任何批评。马来西亚华校建校百年纪念特刊依旧停留在颂德与表扬校绩的华丽层面，未能借此难逢的盛会，发挥校庆应具有的批判与反省意义。可参考杨照，〈一所大学的百年校庆〉，《星洲日报》，2011年4月29日。

⁹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绅士拥有“绅权”来掌握一个地方社群的领导权力。“可是流寓海外的华人，一些依靠都没有，还讲什么传统，什么身份。所以凭借‘神权’来建立‘绅权’，是一个通达的捷径。同时使他的威信，无可动摇。”详见〈陈育崧序〉，收录在林孝胜、吴华等著，《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4月）。

会辛亥前数年，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诸同志到庇能等处，演说革命。时君在大山脚埠属设帐授徒，闻之喜甚，遂与朱步云及诸同志，组织同盟会机关于大山脚。有所举动，必与朱步云及诸同志共之。以故孙中山为总统时闻其功，而旌其义。君外刚内柔，故人畏其威，而怀其德。凡该处每一团体出世，非其发端，即其同意，故日新新民二学校，众推为总理；阅书报社，众推为社长；革命机关，众推为分部长。¹⁰

卢炳勋（字柳堂）来自广东梅县，因“甲午为日所败，逾知非速变政体，无以图存，遂弃儒冠，浮海南渡至槟榔屿”，¹¹落脚大山脚、居林和容雍三埠，欲以经济救国，穷研经商致富之道，同时行医与设帐授徒。1906年，他大概在槟榔屿平章会馆听了孙中山的革命演说，¹²深受感发，与同具使命的朱步云等人于大山脚组织同盟会。朱步云获选为大山脚分会盟主，卢炳勋则推选为阅书报社社长。

朱步云，广东揭县人，“幼慧颖，读书过目成诵，乡人早以国器家宝为期。然而清政秕缪，故毕业后，裹足仕途，……已而弱冠之年，收拾琴剑，来商于庇能属之大山脚。”¹³虽弃儒冠，南来后在大山脚设帐授徒，¹⁴并在孙中山教育改革的呼声上，组织同盟会、书报社与中华革命党，为渗透和控制教育文化机构为改革思潮的传播站，进一步组织新式学校。1906年孙中山来槟的演说，想必朱步云也出席在列：

时孙氏来自内地，以革命方略相商，询谋佥同，相见恨晚，于是亟组织阅书报社为机关，设华文学校以制造人才。内地数次革命，胥有与谋，辛亥既告成功，君虽在南洋，未能执戈从戎，然而身为该埠盟主，转给馈饷，军无乏绝。心力岂不交瘁，功岂浅鲜哉，尤可敬者，当军兴之际，党首索粮电到，适君子死未葬，愀然勿恤，直到机关，召众开议，同志或以为不情。君曰：“国重于家，子死私事耳，吾不敢以私废公。”闻者壮之，欸亦立集。¹⁵

《国民党在马来亚的足迹》一书提及同盟会的规模和组织的阶层时说，同盟会领袖由

¹⁰南洋民史纂修馆编辑部编，《南洋名人集传》第一册（槟城：光华日报，1922），页93。

¹¹南洋民史纂修馆编辑部编，《南洋名人集传》第二册下，页14。《南洋名人集传》第一册和第二册下各收录了卢炳勋传和卢柳堂传，将两篇内容对照，应为同一人；卢炳勋传明确写明“君字柳堂”（但卢柳堂传写“字和祥”），两个传主同样配贤内助叶氏和田氏，生六男六女。两篇传记对他的生命历程记述简繁不一，可相互补足。

¹²据张少宽《孙中山与庇能会议》一书梳理，孙中山曾五次南来槟榔屿。他在1906年偕同胡汉民和汪精卫等同志于1906年借平章会馆开演说大会鼓吹革命。详见张少宽，《孙中山与庇能会议》（槟城：南洋田野研究室，2004年5月），页12。由此推断卢炳勋听到的演说应为孙中山第二次来槟时，即1906年。槟城同盟会在孙中山第二次抵槟时成立，大山脚同盟会或与槟城同盟会同步成立。

¹³南洋民史纂修馆编辑部编，《南洋名人集传》第二册上（槟城：光华日报，1924），页105。

¹⁴远东民史纂修所编，《远东人物志》第七集（槟城：远东民史纂修所，194-?），页90。《南洋名人集传·朱步云》并未记载朱步云设帐授徒的事，《远东人物志》的传记补充了这条重要的资料。

¹⁵南洋民史纂修馆编辑部编：《南洋名人集传》第二册上，页105。朱步云是天主教徒，生前为大山脚圣安纳教堂的义务会长，死后葬在该教堂的坟场。其墓旁为儿子成章之墓，逝世于民国四年（1915）。朱步云紧急汇款捐资军事，或发生在该年。

各帮的上层阶级组成，以受教育、商人或店主的华侨居多，海峡华人较少。更重要的是，他们曾经见过孙中山，与孙中山或汪精卫、胡汉民、黄兴等人共事。¹⁶据《远东人物志》记载，朱步云筹募的军款达致百万，中华民国政府感念他对党国的付出与贡献，赠予奖状徽章及大山脚党分部部长职。

欲以经济救国的卢柳堂、朱步云及其他书报社成员，于大山脚置有多项产业，详见下表：¹⁷

书报社成员	籍贯	行业	产业、公司商号
1.朱步云	广东揭县	商业、种植	创立万怡生商行、怡生洋货行、广祥瑞公司等商业； ¹⁸ 置树胶园计二百亩
2.张天宠	福建南安	商业、种植	创立新同兴号；购置树胶园多丘
3.吴锡照	广东台山	商业、养鱼、种植	创立汇源金铺；购地数亩开辟为鱼池和果园
4.沈永蔗	福建南安	商业、种植业	创立庆丰栈；置六区树胶园、椰园
5.叶祖溜	福建南安	商业	创立万裕号，经营什货
6.卢乙良	广东梅县	锡矿、种植、商业	经营矿务；购置园丘种植槟榔、椰、豆蔻、胡椒和树胶；在马打寮创立广兴树乳店、在居林创立华兴树乳店
7.卢柳堂	广东梅县	医业、种植、商业	行医；购置树胶园五百余亩；创立板厂薯较
8.许连聚	福建海澄	种植、锡矿、商业	在大山脚经营种植业；到吡叻经营锡矿及商业

英殖民官员巴素（Victor Purcell，1896-1965）《马来亚华侨史》谈到威省华侨时说：“在大山脚，仍以开店居多。”¹⁹从上表来看，华侨初抵达大山脚时以开洋货、金铺、什货店居多，符合巴素所说的实境；后期则以种植橡胶园为要务，成为大实业家。橡胶园在大山脚的开拓与发展，在《南洋名人集传·卢乙良》有简略的说明：

当英人于群岛始植胶树时，群疑不敢决，君首倡之，即将自有英暹园地，斩去旧日所植槟榔豆蔻椰胡椒，独植胶树，并劝导族戚，各尽地力，蒙获厚利者不

¹⁶Yong, C. F., McKenna, R B, *The Koumintang Movement in British Malaya, 1912-1949*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6.

¹⁷整理自南洋民史纂修馆编辑部编，《南洋名人集传》第一册至第五册（檳城：光华日报，1922-1941）。

¹⁸远东民史纂修所编，《远东人物志》第七集，页90。

¹⁹巴素著、刘前度译，《马来亚华侨史》（檳城：光华日报有限公司，1950），页47。

少。足徵君之眼光大，智识胜人也。²⁰

橡胶树早在二十世纪初已在西马广泛种植，卢乙良是大山脚首创之人，拥有丰厚的商业根基。父亲流明（字远祥）是第一代南来人，南渡至太平、居林等处从事矿业，开辟思南马埠（Selama）。1874年，卢乙良在当地出生，承继父业，民国二年（1913）在打锡肚建造房子定居。除了经营锡矿，亦种植槟榔、椰、豆蔻和胡椒，继而呼吁英人的号召，改种树胶园。其中一位卢乙良劝导的族戚，大概包括了与他来自同一个广东梅县家乡的卢柳堂。卢柳堂南渡至槟榔屿，随后迁移至大山脚、居林、容雍，除了行医，还开辟山林建筑市场，并响应卢乙良的倡议种植树胶，购置胶园五百余亩。朱步云在1914年欧战发生时，“遂将商业收竭，而专心致志于三百余英亩树胶园种植，及屋宇等不动产业之经营，遂著大富名于遐迩焉。”²¹这一批南来侨民在共同的经济与政治活动上聚首，为大山脚经济发展带来的丰厚财力及社会影响力，²²加速了当地教育的改革与变新。

大山脚书报社组织日新学校的过程，简略记载于日新学校建校史。²³1915年，中华阅书报社为提倡新学，在书报社内组织新式学校，²⁴无奈书报社于1916年解散，学校也被迫停课，大山脚华侨子弟陷入就学无门的窘境。为解决这项问题，书报社结合已在当地扎根三十余年、获居民拥护的福德正神会，议将该会原有的义学堂改制成新学。这项计划遭致部分人士反对，磋商了余年毫无成果，直至两年后方促成改革。创办费首由书报社出资两千元，福德正神会则捐助一千元，并在此后每月津贴学校八十元。从管理部阵容来说，大山脚义学堂董事与日新学校创办董事，完全换了一批人。刻在〈大山脚义学堂碑〉上的董事有黄陈庆、黄跃松、陈成贵、王妈贺、陈换、陈锦隆、张宇及黄跃喜；日新学校创办人之福德正神会理事代表则为陈文赞、林店伯、苏星南、甄锦龙和陈璧如，²⁵无一人从义学堂过渡到新式学校。义学堂与日新学校创立相距二十余年，福德正神会理事或经过改选换了一批人，如玄天庙兼义学总理黄陈庆于1895年成立大山脚义学堂后，不再在其他碑文或文献看到他的名字；²⁶或如上文校

²⁰南洋民史纂修馆编辑部编，《南洋名人集传》第二册下，页18。

²¹远东民史纂修所编，《远东人物志》第七集，页90。

²²据威利斯省历年农作物生产量表，橡胶树是1906年才带进威省，在此之前则以种植水果、椰子、槟榔、稻米、甘蔗和树薯粉为主。威省橡胶树园从1906年的4,009英亩，于1912年已增加至30,580英亩，增幅为762.78%。详见 *Straits Settlement Blue Book 1867-1939*。

²³日新学校校史最早见于邓孟发校长撰写的〈日新学校史略·绪言〉，收录在《公立日新学校校刊》（1948），页10。

²⁴大山脚书报社创办新式学校的消息，另见于《檳城新报》1914年12月28日一篇题为“热心公益之可风”的评论文章，可惜剪报模糊，无法辨识提倡设立书报社的人物是否包括朱步云等人。

²⁵大山脚中华阅书报社十二名创办人当中，八人在林博爱主编的《南洋名人集传》有传；大山脚福德正神会代表五人在《南洋名人集传》无传。该书由檳城革命党员林博爱主编，光华日报出版，大山脚福德正神会理事不获选入传记也是合情的事。此五人资料不详，除了在日新校史出现，未见于其他碑文或报章，难以考察他们在大山脚的经济活动。

²⁶王琛发，〈惠州人在大山脚开发史上的地位与组织的变迁〉，《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第3期（2000年9月），页178-180。

史所述开办新学遭部分人士反对，已截然分割为两个阵营。

新式学校取名日新，于1918年3月2日正式开学。“日新”取名有二说，一取自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意涵，一取自于“日新”二字与“逸仙”粤语音相同，似有纪念国父孙中山而取。²⁷为控制国民党政治思潮渗入华校，英政府于1920年与1924年各别颁布《学校注册法令》与《学校注册津贴条例》，且在1925年下令解散国民党与书报社等多个机关。大部分地区的书报社在这段时期相继遣散，²⁸大山脚书报社亦难逃解散的命运，然其生命却未褪色，转而由日新学校承接起书报社的社会角色。这番转型是为必然，书报社在日新学校成立后已越渐退位，学校继而崛起为地方重要机构。如民国二年（1913），大山脚一对新人在具有时代改革意义的书报社举行文明婚礼；²⁹1923年，另有一对新人结婚，婚礼则择在日新学校举行。朱步云总理为证婚人，日新学校音乐队演奏文明结婚歌曲。³⁰又，举凡举办祝贺孙中山上任大总统的庆典活动、联合工商界庆祝双十节国庆日、纪念总理诞辰、欢迎领事官来访等活动，均为日新学校所主导。举例而言，1923年5月22日，日新学校举办孙中山上任大总统的庆典活动，学生围绕在活动庆典的氛围，纷纷叙说孙中山的功勋。当天的演讲还包括：朱步云总理演述孙先生历史、叶藤仁董事续述孙先生民国以来的经过、来宾续说现时国会选举和国内预备庆祝情形、杨自修校长发挥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意旨。学生亦参与演说的行列，第一届毕业生杨双德和游瑞水演述总统的意义、陈向荣和余梅昌演说共和的真义。³¹大山脚华侨各项庆典“借神圣学堂作会场”，³²由此同盟会、书报社及中华革命党解散后，日新学校成为该埠重要的机构。

日新校董捐资兴学，于1920年获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发褒章。据《槟城新报》1920年10月16日“奖励助学部令照录：驻槟榔屿正领事官戴培元接获教育部指令第1612号，”请他将该份教育文件送至大山脚日新学校。表册内容为：

据呈朱步云等捐资兴学，请予核奖等情，并附送事实表册一件均闻悉。查该员等热心教育，殊堪嘉尚。朱步云、梁安清二员捐资至500元，应照章奖给银色一等褒章。许连聚、张仁员二员捐资至300元以上，应照章奖给银色二等褒章。黄如在、张天宠、黄德成、黄城、沈永蔗、陈绍有、卢柳堂、何翼仁、洪恭顶、缪炳高、王如进、卢乙良、黄芝芳、陈来迎、吴锡照、甄锦龙、陈文成、黄椿岭等十人员，捐资均至100元或200元以上，应照章奖给银色二等褒章。

²⁷撰写校史的邓孟发校长称这番说法无据可考，只能暂且记录在校史册内。然这般流传的说法自与学校国民党政治背景有关。

²⁸《南洋商报》1925年10月27日新闻报导记载：“本坡同文书报社，自奉当地政府解散后，继之者国民党芙蓉总支部、亦已奉命解散……又得一消息，凡海峽殖民地，及马来联邦所辖之七州府内，凡属国民党机关，有概不许其继续存在之消息云。”（页4）；各地书报社解散的新闻报导亦可见于《南洋商报》，1925年10月29日，页4、《南洋商报》，1925年11月23日，页3。

²⁹《槟城新报》，1913年9月1日，页12。

³⁰《槟城新报》，1923年4月17日。

³¹《新国民日报》，1921年5月23日，页9。

³²《槟城新报》，1923年4月17日。

其乾益当、万裕号、大进油较等，捐资均满百元，并应照章给六等褒状，以昭激励。合即检同褒章奖状，令行该正领事查照转发，仰即承领此令。³³

除了日新学校，书报社成员亦捐助其他学校，比如在爪夷公立育英学校鸣谢助学通告，可以看到朱步云与卢柳堂榜上的名字。³⁴另，卢柳堂赠出店宇一间作容雍新民学校的永久校舍，居林觉民学校、槟城时钟学校皆由他出力；³⁵卢乙良将他的洋楼作为启新学校校舍。³⁶书报社成员开拓经济、捐资救国及不遗余力兴学的美事，为众人称誉。传记形容卢柳堂“同侨纷难，常藉君一言以排解，善以劝导，实由其公正足以感人也”，³⁷又说“君外刚内柔，故人畏其威，而怀其德。凡该处每一团体出世，非其发端，即其同意”；³⁸相同的描述亦见于卢耀南的传记：“各界争端，每藉一言以排解。”³⁹他们诚然已凭借经济、政治及教育的影响力，跃居为大山脚华侨社区的领导人。

二、校董席位纷争及选举操纵

朱步云担任日新学校总理十年，直至1927年退位，由梁安清、陈家怡、陈仁樵、黄坚固等人接任，任期很短，校长及职员的聘用随着总理的频密换人而更替，⁴⁰是南洋华侨董事会家常的惯例，内部纷争亦时有所闻。为便于理清黄坚固与陈文泰、朱步云等校董的席位纠纷，下文整理该校1918年至1951年间总理与校长的职位表加以说明：

总理 / 董事长 ⁴¹	在职年份	校长聘用
朱步云	1918	杨自修、饶逸群、杨芷芴
梁安清、黄坚固	1929	章一平、曾华丁
陈家怡	1930	黄镜辉
陈仁樵	1931	朱少华、林绿野
林源泉	1935	林绿野

³³ 《槟城新报》，1920年10月16日，页6。

³⁴ 《槟城新报》，1920年7月10日，页3。

³⁵ 《槟城新报》，1925年7月4日，页6

³⁶ 《槟城新报》，1923年2月8日，页7

³⁷ 南洋民史纂修馆编辑部编，《南洋名人集传》第二册下，页14。

³⁸ 南洋民史纂修馆编辑部编，《南洋名人集传》第一册，页93。

³⁹ 南洋民史纂修馆编辑部编，《南洋名人集传》第二册下，页17。

⁴⁰ 董事滥用职权无故辞退职员之事时有所闻，如《新国民日报》1931年2月4日报导：“槟城通讯云：顷得七州府副提学司通令云，‘为令饬事，本使自莅任以来，迭次发见所辖各校，每届年底，或学期底，慨将教员更换，习为故常，不以为怪。查此种更动其主要原因，不外新任董事，于就职之际，即欲引进亲友，分据校长教员席位，于是对于原有教员，遂不能不加以摈斥。不知此种措施，不特于各该学校前途，大有妨害，即为华人教育之全部计，亦岂为福？’”

⁴¹ 1938年后，学校董事会“总理”一职改称“董事长”。

朱步云	1937	谢陶白
黄坚固	1938	王绍清、许亦周
许明火	1940	许亦周
陈文泰	1941	林鲁生
黄坚固	1946	刘海乐、沈星云、邓孟发
黄坚固	1950	张公达（1950年日新中学成立）

日新学校董事会在二战前后发生了两次严重的席位分配纠纷及操纵选举事件，黄坚固董事长皆涉其中。他在1929年、⁴²1938至1939年以及1946至1951年间担任董事长一职，任职期间颇有建树，该校女子部、夜校、日新中学，甚至于现前日新独中所在爱士顿路的校舍，皆在他担任董事长及建校委员主席（1947-1957年）间建立，以建设功臣称之并不为过。⁴³然这挂在校史走廊墙上让人歌颂的光辉，亦有无法不让人审视的权位纠纷。

（一）1938年福德正神会与日新校董席位分配争议

日新自建校以来，相较于国民党领袖较具优势的地位与话语权，大山脚福德正神会理事则显得寂静与无闻。⁴⁴1930年末，福德正神会董事部倡议开办华侨女子学校，议决首由该会借出一千元作为开办费，并每月认捐八十元，福建会馆、广惠肇会馆、韩江公会、保亨社和永公会所等团体则每月认捐数十元。⁴⁵会议公推陈文泰为临时主席，日新校长黄镜辉为记录，日新前任总理（1929年任职）黄坚固亦参与其中。因大山脚少数不明事理分子暗中极力破坏，女学筹划遂致中途停顿。⁴⁶陈文泰或为福德正神会该届主席，考察各则关于女学开办的剪报，未直接说明其身份及职位，然女学计划既由福德正神会董事部提倡，则临时主席人选应由该会主席担任，日新校长则为记录。是项计划显然由福德正神会及日新学校董事会共同推进，大山脚各团体亦参与其中。

1938年2月，黄坚固上任日新学校总理，重启女学开办计划，于校内成立女子部，同时筹划夜学。福德正神会想参与该项计划，却遭日新校董拒之门外。是年日新学校

⁴²日新校史记录1929年总理为黄坚固。但查阅剪报资料，似乎上半年是梁安清为总理，下半年则黄坚固为总理。详见《公立日新学校校刊》（1948），页10、《槟城新报》，1929年1月8日，页7、《槟城新报》，1929年9月7日，页23。

⁴³关于黄坚固董事长任职时期的建树，可参考洪木玖，〈黄坚固：幼年失学更珍惜办学〉，《马来西亚福建人兴学办教史料集》（吉隆坡：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1993），页323-324、黄欣怡，〈日新学校建设功臣黄坚固〉，《日新时代》第54期（2018年1月），页30-34。

⁴⁴限于史料散佚，日前关于大山脚的资料搜集多采自于《槟城新报》、《光华日报》及《南洋名人集传》对阅书报社成员的学校开办、经济开拓及政治活动的记载，未见福德正神会理事相关的报导。该会本身亦无早期史料留存，无法得知二十世纪初年的经营状况。本文讨论两者各项活动事迹难免有失偏颇，但从传记撰写及报章记事，则侧面反映了书报社在地方上较具优势的话语权。

⁴⁵《槟城新报》，1930年12月31日，页28。此则剪报字迹模糊看不清各团体捐款数额。

⁴⁶大山脚福德正神会成立女学的过程可参考黄欣怡，〈1938年日新学校成立女子部〉，《日新时代》第54期（2018年1月），页7-11。

董事会4月的常务会议记录此事：

一、关于侨众四十八人联函请召开侨众大会解决日新将来建筑校舍事，议决定于本月十七日（星期日）下午一时在该校总校礼堂开侨众会解决之。二、关于福德正神会来函通知该会拟准沈清楚与侨众廿五人等假座日新学校开办夜学事，议决为避免某种麻烦起见，函达该会陈明该校将于最近自行开办，其他各团体无须多此一举。⁴⁷

“为避免某种麻烦起见”、“该校将于最近自行开办”、“其他各团体无须多此一举”，校董文告的用词显然对福德正神会欲参与开办夜学一事充满敌意与防卫。此事或延续建筑校舍事而来，可在4月17日的侨众大会看出端倪：

新闻标题：大山脚昨开侨众大会议决建筑日新学校新校舍，建筑费请福德正神会捐助，并拟向侨众劝募以竟全功

内文：至于福德正神会负责经费，学校董事是否应增加其席位问题，有人提议学校应该交该会办理，但多数谓学校教育应该□□服宗教之分别，福德正神是宗教团体，苟以□□□主办学校，则其他宗教如基督教徒将受影响，故上述提议未经通过。⁴⁸

此则剪报字迹太模糊，尚能从文字中摘录会议引发争议的要点。为出资建筑校舍事，福德正神会提议学校董事会是否应增加他们的席位，并直接表明学校应由该会来办理。无怪乎校董对福德正神会开办夜学事表示强烈抗拒。

据《光华日报·小言版》一位署名“必”的作者投稿〈为大山脚侨众进一言〉，描述了当日侨众大会的情形：“会中意见分歧，争辩剧烈，临时主席陈文泰起而郑重发言，谓会议系因埠众发生意见而开，但望到会者相除成见，共以教育为目标，当此举国上下团结，一心抵御图存之今日，此种现象，我愿其立刻冰消瓦解也。”⁴⁹陈文泰再次代表福德正神会主席担任侨众大会的临时主席，与日新校董及其他华侨对话。议会中，鉴于日前“国难期中，加以土产崩价，市情彼敝，欲进行募捐，实非易事，”⁵⁰有人提议福德正神会的产业既为全埠侨众公业，该会应作日新学校建筑新校舍有力的后援，建筑费请该会捐助。⁵¹同时有人提出“福德正神会负责经费，学校董事是否应增加其席位”，至而将此议题延伸为“日新学校应全权交福德正神会办理”的“企图争取权利之嫌”。⁵²

⁴⁷ 《光华日报》，1938年4月13日。

⁴⁸ 《檳城新报》，1938年4月18日，页2。

⁴⁹ 《光华日报》，1938年4月19日。

⁵⁰ 《光华日报》，1938年4月19日。

⁵¹ 《檳城新报》，1938年4月26日，页2。

⁵² 《檳城新报》，1938年4月18日，页2。

福德正神会这项提议不获通过，多数侨众认为学校应该与宗教团体区分，“苟以福德正神会主办学校，则其他宗教如基督教徒将受影响。”⁵³一名读者来函〈为我大山脚侨胞进一言〉时主张，日新学校与福德正神会的行政应各自独立，相互不碍各团的发展，因为“真正行善的人是不为权利的，何况福德正神会是个正牌的崇奉菩萨的，皆来办新文化教育，是不适合的。在神权熏染下，也许在不久以后，学生都要拜神救国了。”⁵⁴试图以宗教因素来阻挡福德正神会对日新学校董事权位的介入。十九世纪初福德正神会凭借“神权”开办学堂来建立地方威权的路径，新世纪已不再适用。

1938年6月，九十三名侨众联函日新学校董事部，请求召开侨众会议，进一步将冲突升温。⁵⁵黄坚固董事长与会议主席陈大英郑重发表启事反驳，斥责好事之徒挟持私见，私心破坏，以建筑校舍为名，向大山脚侨众索取签名盖章召开侨众大会，又造谣学校董事会欲图拆建伯公庙戏台来扩建校舍，以达破坏学校与福德正神会的关系，并“希图以侨众之力，推倒现年董事”。⁵⁶为确保日新学校廿七年度董事会于1939年蝉联，黄坚固董事长并不敢小觑九十三名大山脚侨众及商家企图推倒现任董事的威胁，于是在董事会选举当日，专请大山脚埠外人士来投票。此事引发激烈争议，日新学校前总理朱步云与侨众二十五人联名来函，要求召开紧急会议：

校董诸位先生台鉴。迳启者，为日新学校于十一月廿日选举董事职，放弃本埠出钱出力热心办学之人，专请埠外人包投票而任董事之职。斯人未曾出钱出力，荣登高位，辞职者多起，众议纷纷，不能解决，羞耻孰甚。本侨众避匿无地，可气又可笑也。况且校董是侨众产生，任贤选能服务学校，何可乱选。经众议投函通告，速发传单，召开侨众紧急大会，可修改议决，否则引起纠纷，众怒难犯，贻害大局，勿谓言之不早也。匆匆上陈，尚此顺请公安。⁵⁷

此项通告虽未说明“埠外人”为谁，但若与1947年选举纠纷对照，则这群外埠人士显然是其他地区的国民党党员。紧急会议于1939年2月12日召开，为杜绝不明的外埠人士投票，朱步云提议修改日新董事会章程。其中章程第五章第九条选举法案修改特别被提起，选票除盖校章外，并需一人签号于票上，才发给本埠各商店；各商店则需将商号盖印于票上，若无商号则可将门牌号数印于票上，以备检查。会议结束前，成立修改章程委员会，共选出七名委员负责草拟。⁵⁸下一届学校董事选举，选票须盖有校章者才有效用。⁵⁹

⁵³ 《槟城新报》，1938年4月18日，页2。

⁵⁴ 《槟城新报》，1938年4月26日，页2。

⁵⁵ 《光华日报》，1938年6月20日。1938年6月19日侨众大会另引发读者对《光华日报》立论不公、报道偏颇的指责，刊登在左倾的《现代日报》。《光华日报》则严厉驳斥相关的指责。详见《光华日报》，1938年6月26日。

⁵⁶ 《光华日报》，1938年6月29日。

⁵⁷ 《光华日报》，1939年2月7日。

⁵⁸ 《槟城新报》，1939年2月14日，页4。

⁵⁹ 《光华日报》，1939年11月22日。

是年4月，市政府为整顿市容，将拆除一部分屋宇，日新学校总校在拆除名列。⁶⁰建筑新校舍事顿成燃眉之急，加速了福德正神会与日新董事会的合作计划，积极商讨修改选票章程及组织建设校舍委员会事。1940年1月7日，两会共开联席侨众大会，组织建校委员会，各社团代表人数为：福德正神会十二名，学校常务九名，广东会馆、广惠肇会馆、韩江公会、福建会馆各派五名，共组织建校委员会。建委会选举结果为：

大山脚‘日新学校建筑校舍委员会常务委员：主席团主任陈文泰、许明火、洪维发、陈金发、陈毓山、林奏凯、梅伟民；总务郑石三、陈时吉、黄坚固……⁶¹

福德正神会主席陈文泰任日新学校建筑校舍委员会常务委员主席团主任，日新新届董事长许明火次之，黄坚固则出任委员会的总务。⁶²耐人寻味的是，获得蝉联1940年度学校董事长一职的黄坚固在正式上任前已改任财政，原任财政的许明火则改任董事长职。⁶³各项剪报未说明许明火是代表福德正神会或学校常务出任董事长一职，然从1938年6月未出席由日新董事会主办的侨众大会来观，⁶⁴许明火应是福德正神会的代表。1941年，陈文泰获推选为学校新任董事长。许明火与陈文泰相继接任学校董事长一职后，福德正神会正式掌权日新学校董事会与学校建筑校舍委员会。陈文泰、⁶⁵黄坚固与朱步云皆是国民党党员，此次纠纷或可理解为国民党内部派系相互竞逐的延伸，具有华侨社会代表性的学校董事会成了他们争权的场域。

（二）1947年国民党与左派校董选举纠纷

陈文泰董事长上任未满一年，学校即因日军入侵被迫停课，他也在逃亡过程不知所踪，二战结束后不曾再回到大山脚来。⁶⁶1945年8月，日军撤退后，大山脚侨众遴选黄坚固为主席复办大山脚各社区华校。1946年日新学校复办后仍获选为董事长，1948年旧董事会蝉联，被侨众指责操纵选举。《现代日报》1947年11月25日报导详细交代当天选举经过，为说明黄坚固董事长如何运动党员前来投票，兹将全篇报导载录于下

⁶⁰《檳城新报》，1939年4月25日，页2。

⁶¹《光华日报》，1940年1月9日。

⁶²《光华日报》，1940年1月25日。

⁶³《光华日报》，1939年12月5日、《光华日报》1939年12月8日。

⁶⁴共有61名侨众登报否认由日新学校董事会开办的侨众大会，当日赴会者只有二十三人，“计黄坚固、王美成、吴锡照、叶云兴、梁安清、陈金云、黄嘉兴、陈时榜、黄长兴、沈清楚、黄秦光、林于利、陈芳瑞、邝祯祥、何国良、黄平（冯煊代）、伍秋生、杨志生、沈星云、严卫民、陈大英、刘再成、王来基等。”未见陈文泰与许明火。详见《光华日报》1938年6月20日。

⁶⁵陈文泰在《南洋名人集传》有传，传记称他“至若国事民生，尝与侨界通力合作，不稍懈怠。”他活跃于新安拔及大山脚埠，继承父亲的椰子园产业，与侨众共同创办新安拔文明小学校。详见南洋民史纂修馆编辑部编，《南洋名人集传》第二册下，页147。

⁶⁶关于陈文泰的事迹，可参考黄欣怡，〈写在文明小学创校95周年之际〉，《当今大马》，2020年9月17日。

67:

(大山脚通讯)本埠公立日新学校,廿三日召开侨众大会,选举卅七年度董事,竟生意外风波,辩论激烈,以致不欢而散。查本届选举,事前市面即谣传某方拟一手包办,当地侨众均携朋往。昨日上午十时,开始发出选举票时,即陆续发现有不少本埠人士,公然到会领取选举票,同时有人用罗厘巴士车,由外埠专车载人来投票。当场即有人提出两个问题,一,本校选举董事,外埠人士有无选举权?二,大山脚区之领域,包括哪些地区在内,北海是否大山脚联合区?主席含糊其词,谓:“大山脚区之领域,极阔极阔,外埠人士到会投票,系热心教育表示,毋须阻止”云云。及后选举进行中,又继续有不少怪现象发生,该埠党团联络檳城北海居林各地团员开联欢会,会毕,均到该校领票投选。更有许多小孩子,也纷纷到会领取选票,且北海某校教员也到会领取选票,同时更发现有不少当地人士,一人竟到会领取四、五次选票,主席均不理睬会众发问,一律发于选票,一时市上人言啧啧,咸谓开本埠未有之怪例,大都表示不满。及一时截止投票,一直开票至九时,才正式开会,当即有不少侨党,纷纷提出质问,请主席解释此次选举是否合法。主席黄坚固,除承认确有许多外埠人士到会投票,及有以应用车给投票及领取多次选票外,并谓:“本校正进行建校,须向外埠募捐,不能拒绝外埠人士之有心投票”云云,当又有人质问,“主席既谓外埠人士,有权前来投票,是否取全权负责”。主席答称:“我做主席,并没有薪金,我犯不着负这些责任”,一时是否合法问题,几经辩论,终于无结果中由主席宣布散会云,据一般人士所知,此次某方包办选举,利用小童领票,……,现象之可怪,堪资社会人士寻味云。⁶⁸

上文提及向黄坚固董事长提出质问的侨党,应当包括了左派的校董。11月29日,日新学校董事监学陈金砂前往檳榔屿开办招待记者会报告日新学校董事会“选举真相”,同时斥责小报《新生报》“异党阴谋失败”、“有人欲造成赤色气氛”等的荒唐言论。他首先交代日新董事会成员组成结构,日新董事会共有三十一名董事,国民党党员共有十余名,约占董事会的五分之二,其他则为各帮派人士;十五名教师中共有四名国民党党员及一位民主同盟,其余教师则没有党派。黄坚固董事长是国民党常委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长,尽管董教帮派不一,学校董事会选举向来民主。此次失误,陈金砂认为与党团有关:“本埠的国民党党员,大部分是商家,大都忙于本身的业务,一向来对于社会的事业,是不大注意的。不意自中委陈国础到大山脚党团部宣慰后,一般国民党人士,竟大都注意业务以外的社会事业来了。”⁶⁹陈金砂在记者会提及的中委陈国础是海外国民党部副主席。马来亚国民党在二战后获得中央部的慰问与扶持,迅速重生,海

⁶⁷此次选举包办事件,目前只搜集了《现代日报》对相关事件的报导,无法找出《光华日报》相关记事以及黄坚固董事长的回应与之对照,非常可惜。

⁶⁸《现代日报》,1947年11月25日。

⁶⁹《现代日报》,1947年11月30日。

外国民党于1946年在新加坡成立。⁷⁰陈国础在此段期间走访各州，获得各地国民党支部的热烈欢迎。仅从他抵达檳城接受记者采访的谈话，大致可推敲他对大山脚国民党党员慰问的内容。陈国础认为目前“国军军事好转，中国前途光明，惟须先解决中共，而后调整金融。”又谓“国内党团经已实行合并，海外不久亦将实行合并。”⁷¹为统一行政和减少开销，三民主义青年团于1948年1月1日加盟国民党。黄坚固董事长是国民党常委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团长，成了陈国础经过各地观察到的现象：“团之负责人多为党员，事实上早已合并云。”

以陈金砂、梁百龄等为首的校董，发动侨众及商店三百七十余名署函否认该选举，“并促本董事部在四十八小时内召开侨众大会，另行合法选举，惟董事主席黄坚固，固执己见，不顾民意，为此特登报，请其于贰天内答复侨众，否则，余等将不承认其正董事长之职权，另行召开侨众大会。”⁷²该函由“大山脚陈金砂梁百龄等十六名日新校董敬启”，若以他在记者会交代“日新董事会共有三十一名董事”而言，则以黄坚固为首的国民党员共有十五名，其左派校董人数多于国民党一人，应是促成黄坚固董事长发动外埠党员前来投票的原因。11月30日，梅振邦视学官前来日新学校调解校董纠纷，听取两方意见，该日大山脚埠“冠盖如云”，檳城国民党部谢秘书等各地党团重要人物纷纷莅临。以陈金砂、梁百龄为首的校董主张另选校董，中选校董则不接受。“讨论结果表决提出新法，以本埠商店为选举单位，由梅视学官征求黄坚固同意，另行选举，惟视学官是否能达到圆满调解目的，当看事实如何进展。”⁷³12月20日，梅视学官寄函于日新学校董事会，嘱咐在新董选出以前，暂不允予注册，并令旧董事会暂时负责，直至新校董由赞助人选出为止。⁷⁴12月30日，大山脚日新学校卅七年度董事复选成绩登报，黄坚固董事长获得蝉联。⁷⁵接下来数年，黄坚固董事长皆得以成功蝉联，直至1951年末卸任。

相较于1938年日新校董与福德正神会的争权纠纷乃派系之争；1947年从陈金砂的记者会发言及《现代日报》刊出的报导，此次纠纷更倾向于左派董事与国民党派董事的争权，由此陈金砂才激烈反驳小报称他们为“异党阴谋失败”。是年辞退左翼教员的事，也能说明此次选举纠纷的性质。沈星云校长于1946年12月由日新学校董事会专程到怡保聘请。⁷⁶他曾于1937在日新学校担任教务长一职长达三年，活跃社区抗日运动，是《怡保日报》主编，过去曾与黄坚固董事长共同协办侨众募捐活动。此次前来掌管校务颇见起色，日新学校良好的学风为侨众与视学官赞扬，昔日大山脚埠可见的孩子斗架、赌博、吸烟和粗语骂人等问题，自沈星云校长上任以来获得改善。⁷⁷此次的聘请，陈金砂解释道：“当时磋商之下，由国民党及各帮派各派代表一位，特聘沈星

⁷⁰Yong, C. F., McKenna, R B, *The Koumintang Movement in British Malaya, 1912-1949*, p.201.

⁷¹《南洋商报》，1947年11月18日，页7。

⁷²《现代日报》，1947年11月30日。

⁷³《现代日报》，1947年12月2日。

⁷⁴《现代日报》，1947年12月21日。

⁷⁵《现代日报》，1947年12月31日。

⁷⁶《现代日报》，1946年12月7日。

⁷⁷《现代日报》，1947年11月30日。

云来长敝校，因为沈君较前曾在敝校服务三年，人格和学问，各方都很深知，所以国民党及其他方面都一致同意。”⁷⁸沈星云校长任职一年后不获续约，其儿子春兴于2018年受访时说：“1947年，学校董事分成左派和国民党派两派。父亲属左派，1947年董事部改选，左派人士多，由此建议邀请他前来日新学校掌校。到了年尾董事会改选后，以国民党派居多。董事部没有说要把父亲辞退，然教师每年一聘，校长没有拿到聘书，代表不续约的意思，部分左派老师也纷纷离开。”⁷⁹沈春兴于是年在日新学校就读初小四年级，因大人讨论事情，小孩总在身边安静地听，他对学校发生的事比一般学生记得还清楚，可为1947年董事会风波提供另一种记述。

1948年，沈星云校长离职后，董事会升任教员邓孟发为校长。是年5月20日，大山脚侨众热烈庆祝祖国行宪首任总统蒋介石就职典礼，假日新学校体育场举行，到会者包括了日新校友会、威华教师会、国民党大山脚分部、三民主义青年团大山脚分部、广惠肇会馆、福建会馆、威省建造行、韩江公会、保亨社及邻近华校皆来参与。⁸⁰该年双十节，各地因英政府颁布紧急状态，国庆日庆典较往年逊色，日新学校则如常举办游艺会，欢迎各界前来参与，非常拥挤。⁸¹1949年国际局势骤变，往年大势举办的双十节庆典盛会，在中国共产党于10月1日掌权后，变得让人为难。英殖民政府并不阻止侨众庆祝，也不限商家学校挂哪种国旗，然政府给予的自由却让政治倾向不怎么明确的侨众更为发窘。⁸²至于大山脚举办情况，见于以下报导：

一年一度的国庆日，今已届临，但市上十分沉静，已无往年的热闹庆祝景象，仅日新学校举行联合庆祝会外，其他的社团会馆，都个别举行庆祝，仪式简肃，商店大半休息一天，对于悬旗方面，国民政府与人民政府的国旗，均有悬挂，亦有商店全不悬挂，以示缄默，市面安静如常，以至记者发稿时止尚无意外事件发生云云。⁸³

早在5月9日，英政府已宣布国民党为非法组织。10月10日那天，日新学校照旧联合工商会庆祝双十节及举办游艺会。黄坚固董事长借此盛会，与同是国民党背景的新友及中正学校董事会决议将三校合并，增设初中班，仍以日新为名，于10月10日在日新总校举行合并仪式，由槟州华校视学官梅振邦莅临主持。此后乃定是日为校庆日，“亦是具有重要性之一纪念日也。”⁸⁴中共掌权后，已无法实现陈国础“惟须先解决中共”的愿景。黄坚固董事长此举，无疑是在国共大分裂时代，向外展示校董鲜明的政党身份及坚决的政治立场。

⁷⁸ 《现代日报》，1947年11月25日。

⁷⁹ 黄欣怡，〈日新学校复办后第一届初小毕业生沈春兴〉，《日新时代》第58期（2019年1月），页13。

⁸⁰ 《南洋商报》，1948年5月30日，页7。

⁸¹ 《南洋商报》，1948年10月15日，页8。

⁸² 《南洋商报》，1949年10月12日，页9。

⁸³ 《南洋商报》，1949年10月13日，页8。

⁸⁴ 邓孟发，〈本校史略〉，《日新小学建校特刊》（1967年），页7。

1950年代，自中共掌权和马来亚争取独立后，华社庆祝双十节的氛围越发消极。1957年国家独立后，联合邦首相东姑阿都拉曼认为马来亚华人今年不庆祝双十节是为极好现象，他说：“政府并无禁止庆祝双十节，而今年停止庆祝，乃显示华人矢忠本邦。”⁸⁵日新中小学的庆祝情况未见任何新闻报导，不得而知。1957年《威省大山脚日新中学初中三第六届同学录》刊载具有国民党党徽色彩的校徽，以及数十个至今还摆放在独中校园的花盆，为后人留下生趣的说明：



图一：大山脚日新中小学1957年校徽。⁸⁶

图二：日新独中校园依然可见“日新中学1957.10.10”的花盆。

黄坚固董事长于1957年11月逝世，由叶万尚董事长（1911-1980）接任建校委员会主席一职，极力推动建校工作。相较于早期校董交织在政治、经济及教育的网络，叶万尚董事长则以大山脚闻商的身份进入董事会，未见其有任何政党背景。⁸⁷日新学校董事会的国民党背景也在黄坚固董事长逝世后逐渐淡化。

结语

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中期，大山脚华侨社会经历了数次的领导层变化。原为掌管大山脚贸易场所、教育及民众一切生活福利的福德正神会，在同盟会、书报社及中华革命党分部相继于1906年设立后，社区角色逐渐淡化。书报社成员在大山脚埠开发种植、锡矿及商店等贸易场所，经济发展带来的丰厚财力，加速政治及教育的革新。他们凭借经济、政治及教育的影响力，跃居为大山脚华侨社区的领导人。

⁸⁵司法兼内政部长苏里曼氏亦对此事予以好评：“此乃四十六年来，本邦华人首次不庆祝双十节。由此乃显示人民已选择其专一矢忠对象。无疑的，华人已接受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之劝告，向本邦作不二效忠”。详见《檳城新报》，1957年10月13日，页9。

⁸⁶1957年校徽的设计图最早见于1948年《公立日新学校校刊》的校旗。

⁸⁷1958年，叶万尚董事长获膺最高元首陛下赐予 AMN 勋衔，1967年获 PPN 建国有功纪念章。他担任日新五校（日新幼稚园、小学 A&B 校、独中、国中）董事长一职长达二十二年，是该校建校以来任期最长的董事长。详见〈日新五校董事长叶万尚崇尚办学〉，曾荣盛编，《马来西亚福建人兴学办教史料集》，页335。

沉寂一时的大山脚福德正神会，于1938年为出资建筑校舍，提议学校董事会应增加其席位，并直接表明学校应由该会来办理。黄坚固总理为了防卫福德正神会的争权，于廿七年度董事会动员外埠国民党党员前来投票。前任总理兼老国民党领袖朱步云召开紧急会议抗议，侨众大会结果为，组织以福德正神会为首的建校委员会，并任该会主席陈文泰为日新学校建筑校舍委员会常务委员主席团主任。福德正神会在许明火及陈文泰相继出任日新学校董事长一职，正式掌权日新学校董事会与学校建筑校舍委员会。1947年，黄坚固董事长再次为保住旧董事会蝉联，包办选举，引发左派校董抗议重选。前后两次纠纷，涉及机构及政治背景各有不同。第一次纠纷可理解为国民党内部派系相互竞逐的延伸，具有华侨社会代表性的学校董事会成了他们争权的场域；第二次纠纷则是国民党及左派校董的争权。黄坚固董事长得以在复选成功蝉联，1948年领导大山脚侨众热烈庆祝祖国行宪首任总统蒋介石就职典礼，1949年10月10日庆祝双十节及举办游艺会，并举行三校合并仪式，定是日为校庆日。在国共大分裂的时代，此举无疑是向外展示校董鲜明的政治立场。1950年迈入中共掌权和马来亚争取独立的时代，校董难以抵抗马来亚化的浪潮，董事会的国民党背景也在黄坚固董事长逝世后逐渐淡化。

【征引文献】

一、官方报告书

Straits Settlement Blue Book 1867-1939

二、报刊、校刊

《槟城新报》，1913至1914；1920；1923；1925；1929；1931；1938至1939；1957。

《光华日报》，1938至1940；2018。

《南洋商报》，1925；1947至1949。

《现代日报》，1946至1947。

《新国民日报》，1921。

《星洲日报》，2011。

《槟城阅书报社廿四周年纪念特刊》（槟城：槟城阅书报社，1931?）。

《公立日新学校校刊》（1948）。

《威省大山脚日新中学初中三第六届同学录》（1957）。

黄欣怡，〈1938年日新学校成立女子部〉，《日新时代》第54期（2018年1月）。

_____，〈日新学校建设功臣黄坚固〉，《日新时代》第54期（2018年1月）。

_____，〈日新学校复办后第一届初小毕业生沈春兴〉，《日新时代》第58期（2019年1月）。

三、近人著作

巴素著、刘前度译，《马来亚华侨史》，槟城：光华日报有限公司，1950。

刘士木等编，《南洋华侨教育论文集》，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1929。

远东民史纂修所编，《远东人物志》第七集，槟城：远东民史纂修所，194-?。

张少宽，《孙中山与庇能会议》，槟城：南洋田野研究室，2004。

林孝胜、吴华等著，《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

南洋民史纂修馆编辑部编，《南洋名人集传》第一册至第五册，檳城：光华日报，1922-1941。

黄庭康著、李宗义译，《比较霸权：战后新加坡及香港的华文学校政治》，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8。

曾荣盛等编，《马来西亚福建人兴学办教史料集》，吉隆坡：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1993。

Yong, C. F., McKenna, R B. *The Koumintang Movement in British Malaya, 1912-1949*.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0.

四、期刊论文

王琛发，〈惠州人在大山脚开发史上的地位与组织的变迁〉，《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第3期（2000年9月），页153-186。

五、网络独立媒体

黄欣怡，〈写在文明小学创校95周年之际〉，《当今大马》，2020年9月17日。
<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542926>，浏览日期：2021年7月2日。